

比较文学基本范畴与经典文献丛书
顾问 杨慧林 主编 高旭东

平行研究·世界文学

高旭东 蒋永影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平行研究·世界文学

高旭东 蒋永影 著

比较文学基本范畴与经典文献丛书
顾问 杨慧林 主编 高旭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行研究·世界文学 / 高旭东, 蒋永影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9
(比较文学基本范畴与经典文献丛书)

ISBN 978-7-301-28513-8

I. ①平… II. ①高… ②蒋… III. ①世界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7897号

书 名	平行研究·世界文学 PINGXING YANJIU · SHIJIE WENXUE
著作责任者	高旭东 蒋永影 著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513-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kupw@qq.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6820
印 刷 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205 千字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本书荣获中国人民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引导专项资金资助

目 录

平行研究 001

第一章 平行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范畴 003

第一节 平行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与比较文学学派的关系 003

第二节 平行研究对中西比较文学疆界的拓展 012

第二章 平行研究的可比性 019

第一节 可比性的归类原则 020

第二节 中西文学的平行研究要顾及文化的巨大差异 024

第三节 设置问题的研究方法 035

第四节 平行研究在跨文化比较中应该遵循的原则 046

第三章 诗可以怨：平行研究经典文献评析 057

第一节 钱锺书学术研究的清华传统 057

第二节 《诗可以怨》的理论创新与中西会通 061

第三节 诗可以怨的理论限度 080

世界文学 085

第一章 世界文学的提出：歌德与马克思、恩格斯 087

第一节 歌德与世界文学 087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与世界文学 096

第二章 世界文学在西方与中国 103

第一节 歌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西方世界文学研究 103

第二节 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 112

第三章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外国文学 121

第一节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121

第二节 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 127

第四章 世界文学：遴选与翻译 134

第五章 世界文学的后经典文献评析 143

平行研究中英文主要资料 170

世界文学中英文主要资料 212

后记 247

平行研究

第一章

平行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范畴

影响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范畴是与生俱来的，但将平行研究列为比较文学的基本范畴，却是这门学科产生很久之后的事情——20 世纪中叶美国人对法国人的比较文学研究方向进行批判反省后所产生的。

第一节 平行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与比较文学学派的关系

正如探讨国与国之间文学的渊源、接受等联系的影响研究，早在比较文学这门学科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研究文学与哲学、历史关系的跨学科研究甚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诗学》；我们所要讨论的平行研究也有一个前学科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在西方是很早的，譬如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学者不是基于影响的事实联系而对希腊与罗马文学进行的批评。我们熟知的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与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在他们的文学批评中，对德国

同法国、英国、西班牙、挪威等不同国家的文学进行了广泛的比较与对比。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把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戏剧同法国与德国的戏剧进行比较，进而揭示三个国家文学不同的民族特点。恩格斯也曾把法国小说同德国小说对婚姻题材的不同表现进行过有趣的比较：法国小说可以作为天主教婚姻的镜子，德国小说可以作为新教婚姻的镜子；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人得到少女，在法国小说中是丈夫得到绿帽子。这些比较更多不是基于文学的渊源、接受等联系的影响研究，而是属于平行研究的范畴。

然而，当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法国产生的时候，却忽视了对比，而将比较文学看成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对象是各国、各民族与各语言之间文学的渊源、接受等事实联系的研究。法国学者伽列（J-M Carre，又译卡雷）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在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至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des relations spirituelles internationales）与实际联系（des rapports de fait）。”^①基亚（Marius-Francois Guyard）甚至认为比较文学是起错了名字的一门学科，正确的名字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②伽列是法国比较文学学科形成期的学者巴登斯贝耶（F. Baldensperger）的学生，基亚又是伽列的学生。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忽视甚至排斥比较文学的“比较”，而将比较文学看成是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各国、各民族与各

① [法] J-M. 伽列：《比较文学·初版序言》，参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3页。

② 基亚：《比较文学·前言》，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语言之间文学的渊源与媒介、放送与接受等事实联系。

可以说,最早产生的比较文学学科的主导研究倾向就是影响研究,基本上排斥以比较为特征的平行研究。这与比较文学产生的文化语境有关。法国大革命、浪漫主义的文化潮流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兴起的比较学科,是比较文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在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入侵欧洲各国的时候,几乎入侵到哪个国家就激起了哪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热情,而同时又将先进的文化带入了那个国家。而浪漫主义的文化潮流与古典主义强调普遍性不同,而是强调独特性和个性。这样,一方面是民族热情的高涨与对民族个性的强调,另一方面却是各个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一方面是针对民族历史的看重使得文学史家要撰写本民族的文学史,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他们的民族文学史却是欧洲整个文学发展的相互渗透与贯通的网状结构之中的一个环节和部分。因此,比较文学的产生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而在这种文化语境下产生的比较文学,注重的就是各国、各民族和各语言之间文学的影响,研究本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或本国文学的外来渊源以及放送者、媒介与接受者构成的影响路线。因而最早产生的比较文学也就理所当然地属于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只不过是民族文学史不同的国际文学关系史而已。而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比较学科很兴盛,甚至比较文学这一名称在19世纪初的提出都是模仿“比较解剖学”而来的。然而,19世纪机械论的世界观和实证主义哲学,则给法国的比较文学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使刚刚诞生的比较文学侧重于事实联系的探讨与致力于文学研究科学化的企图。

从戴克斯特(J. Texte)到巴登斯贝耶、伽列、基亚,虽然从19世纪来到20世纪,然而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家的基本理念没有改变。但

是，20世纪是人类观念变化最大的一个世纪，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战争的肆虐，上帝观念的崩溃给文学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对论突破了牛顿力学的局限，刷新了人们的世界观。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工具理性的过盛，也使得20世纪的存在主义与生命哲学对机械的世界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这种文化语境下，20世纪的文学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世纪的文学理论出于对科学的崇敬和对实证主义哲学的笃信，想从文学的事实材料中找寻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尤其是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文学理论，将文学当成了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和摹写。而20世纪的文学理论则认为文学应该研究的是文学的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不同于哲学思想、政治军事、历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独特性，于是文学的陌生化（形式主义）与虚构（新批评）等特性就被凸现出来。在20世纪的哲学中，不仅仅是文学的虚构性得以强调，甚至历史学作为个体的人在特定文化语境中对于过去情境的呈现，其科学真实性也大打折扣。19世纪的文学理论将研究视野放在作家身上太多，甚至将文学文本的研究与对作家的研究进行对应，所以传记学的研究比较兴盛；但是在20世纪，由于基督教的衰落，言说者受到了忽视——新批评认为作家的“意图谬误”使得研究者不应该过多地执著于对作家的研究，而应该将重心放到对作品本文的细读上；接受美学认为文本一旦创造出来，就与作家脱离了关系，怎样解读文本是读者的事情，于是就将研究的重心放到了读者那里。

另一方面，既然这门新生的学科名为比较文学，无论是法文的 *Littérature Comparée*，还是阿诺德（Matthew Arnold）从法文翻译而来的英文的 *Comparative Literature*，都突出了这门学科的比较而非影响。因此，尽管伽列、基亚等法国比较文学家极力否认比较在这门学科中

的作用，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否认，尤其是在比较文学的实践层面上。在19世纪后半期，德国学者就对荷马史诗与《尼伯龙根之歌》进行了平行类比的研究。19世纪中后期，被称为俄罗斯比较文学之父的维谢洛夫斯基（Alexander Veselovsk）对各民族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学以及民间文学的类似现象进行广泛的类型比较，建立了颇具俄罗斯特色的历史比较文艺学与比较文学的类型学。他虽然颇受19世纪实证主义的影响，强调文学的影响，但他又强调历史对文学发展的制约，并因人类历史的某种结构相似性而产生文学上相似的类型。因此，比较方法并不完全限于文学的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而是要在一系列平行的相似事实上进行因果性的历史归纳与归类，寻求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

基于文化语境的巨变以及在比较文学实践中比较的突出地位，比较文学若是仍然在法国人建造的影响研究与事实联系的埃菲尔铁塔中徘徊，那才是不正常的。1958年在美国的教堂山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的韦勒克（René Wellek）宣读了他的著名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针对既有的以法国人为主导的比较文学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抨击。韦勒克认为，比较文学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正是比较文学界陈腐的文学观念造成的。当20世纪整个的文学理论都转向了注重文学性的文本研究的时候，比较文学的主潮却仍然在忽视对作品文本的美学研究，只重视对作品文本的外缘的事实联系的研究，将文学研究当成了外贸，将比较文学当成了国际贸易。这种注重影响研究与事实联系的比较文学的哲学基础，则是已经陈腐了的19世纪的唯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在韦勒克对法国人的比较文学路线冲击之后，响应并追随韦勒克的被称为美国学派，而传统的以法国为主导的比较文学路线则被称为法国学派。

韦勒克是英美新批评阵营中的批评家，而新批评是从对文本的细读起家的。新批评虽然没有像形式主义批评那样陷入纯粹科学主义的分析，对审美经验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还有所关注；但是与形式主义批评一样，新批评也致力于对文本进行文学性的研究，将作品本文看成是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的本体，并且致力于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分，而不再注重对作家的研究以及对作品的历史的与实证的研究。所以韦勒克后来在与人合著的《文学理论》中，将文学的本质说成是虚构（与新批评的另一批评家瑞恰兹 I. A. Richards 将艺术说成是一种“伪陈述”极为相似），并且将历史的、社会的、传记的等等研究称之为文学的外部研究，将文体、格律、意象等等的研究称为文学的内部研究。在韦勒克身后出现的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雷马克（H. H. Remark）、奥尔德里奇（A. O. Aldridge）、韦斯坦因（U. Weisstein）等学者，都抛开了法国人强调的各国、各民族和各语言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转而强调没有事实联系的各国、各民族和各语言之间的文学比较，甚至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艺术、哲学、社会学、历史、宗教、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之间的比较（被称为跨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或科际研究）。没有事实联系与影响关系的各国、各民族和各语言之间文学的比较，就叫做平行研究。另一令人瞩目的转向是，美国学派对文学性与美学研究的强调，使得比较文学有从文学史的边缘学科向文学理论的边缘学科的转变的趋势，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中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如果说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限于文学史的领域，只不过由于比较文学超出国家、民族与语言界限的性质而被称为“国际文学关系史”，那么美国学派给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则将重心转到比较上来。雷马克说：“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

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他还说：“这一定义大概是被美国大多数比较文学研究者所接受”的。^①不过他认为，法国学派是不认可这个定义的：“法国比较文学否定‘纯粹’的比较，它忠实于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研究的传统，即实证主义所坚持并热切期望的文学研究的‘科学性’。按照这种观点，纯粹的类比是武断的、偶然的和主观的，这种类比不会得出任何结论，尤其是不能得出有更大意义的、系统的、概括性的结论。”^②尽管多数的法国比较学者抵制比较文学研究没有事实联系与影响关系的平行研究，后来佛克马（Douwe W. Fokkema）等人致力于消解学派之争而提出比较文学应该以面对问题为导向，然而在美国学派的身后，没有事实联系与影响关系的平行研究还是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开花结果，并在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

事实上，比较文学在俄苏一直以来就重视影响研究而不排斥平行研究，从维谢洛夫斯基到日尔蒙斯基（Viktor Zhirmunsky）都是如此。日尔蒙斯基从1924年的博士论文《拜伦与普希金》，30年代的《比较文艺学和文学影响问题》《俄国文学中的歌德》《普希金与西方文学》，到1940年整理注释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出版，表明他在学术精神上承继着维谢洛夫斯基的比较文学遗产。然而，4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在苏联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科而受到批判，到50年代中后期被打倒的日尔蒙斯基才有了发言权。1967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日尔蒙斯基发表《作为国际现象的文学潮流》，像

① 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见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页。

② 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67页。

韦勒克一样抨击西方比较文学的现状，沉潜多年的学术火花得以以苏联学派的面目绽放。他激烈批判单纯文本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类比，而割裂历史的发展与文学的关系，从而使比较文学受到广泛的质疑，并乐观地展望了以科学的历史方法进行比较文学的类型学研究，以为世界文学的出现创造条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背景，苏联比较文学一开始就呈现出与西方比较文学不同的特点，他们看重社会背景尤其是经济基础对比较文学的制约，强调历史的观念，讲求类似与差别的辩证统一、一般与特殊的辩证统一。强调历史的观念是黑格尔哲学的特点，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曾说哲学史就是哲学，而辩证法更是黑格尔哲学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的观念和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汲取。而社会经济基础对文学的制约，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特征。因此，日尔蒙斯基指出，文学现象的相似固然可能是影响的结果，通过作家的创造性接受融汇到自己的民族传统中来，然而也可能是社会历史与经济基础的类似而形成的，并不一定是影响的结果，研究者完全可以从类型学的角度对这些相似的文学现象进行历史比较研究。

苏联的解体使得昙花一现的比较文学苏联学派不复存在，世界的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集团与以苏联为首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已经让位给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由于文化、语言和种族的差异而导致的矛盾与融汇。亨廷顿（S.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提出的。于是，一种席卷比较文学的文化研究（不同于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的含义）与比较文化的热潮汹涌而来。悲观者以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将导致世界的对立冲突，乐观者以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将再造世界新的文明。尽管价值观有差异，

但是在对文化研究重要性的承认上却是一致的。1991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第13次大会上,对文化的强调已经初露端倪,而到了1994年在加拿大埃德蒙顿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第14次大会上,议题就是“文学与个性:语言,文化,社会”(Literature and Diversity: Languages, Cultures, Societies),所以有人将这个议题意译成“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在这次大会上,比较文化的主题是如此惹人注目,以至于有的与会代表呼吁比较文学有被比较文化取代的危险。在1997年荷兰莱顿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第15次大会上,议题则成为“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已经密切地融合在一起。而在中国比较文学界,关于中国学派的讨论一直不绝如缕,从台湾的“阐发法”,香港的“中庸学派”,到苏联解体后中国大陆的“跨文明”的“变异研究”,不但没有排斥平行研究,而且从“阐发法”到“跨文明”的“变异研究”,这是连开放的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等美国学派的学者也曾反对的跨异质文化的平行研究。所谓跨异质文化,就是两个大文化之间没有任何同源关系。阿拉伯国家信奉的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同属于一神教,而且从历史上看它们还具有同源的关系。印度也是宗教国家,虽然信奉的是多神教,但是与欧罗巴语系是同源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虽然也互有影响,但是从总体上是在互不相关的语境中成长起来的,而且中国是世界文化中唯一不以宗教为根底而以伦理与审美为根底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看,中西比较文学将是以平行研究为主导的。所谓“阐发法”,不能像台湾学者所解释的单向度地以西方系统的文学理论阐发中国的文学,而应该是中西文学理论对中西文学的双向阐发,这就会导向平行研究中的跨文化的文学对话。